

柯尔克孜族

柯

尔克孜族

新疆乌恰县库拉日克村吾依组调查

主 编：董秀团
万雪玉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云南大学出版社



柯尔克孜族

新疆乌恰县库拉日克村吾依组调查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

主 编：董秀团
万雪玉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柯尔克孜族: 新疆乌恰县库拉日克村吾依组调查/董秀团, 万雪玉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丛书/高发元主编)

ISBN 7-81068-790-5

I. 柯... II. ①董... ②万... III. 柯尔克孜族—居住区—调查报告—乌恰县 IV. K28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5911 号

柯尔克孜族——新疆乌恰县库拉日克村吾依组调查

主 编: 董秀团 万雪玉

责任编辑: 张丽华

责任校对: 段建堂等

装帧设计: 刘 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5.625

插 页: 8

字 数: 387 千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068-790-5/C·73

定 价: 32.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1071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 0871-5162822

总 序

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 高发元

1956年~1958年，国家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工作，搜集到上千万字的资料，撰写出少数民族简史、简志和自治地方概况三套丛书的书稿，整理调查资料300余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编写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书》）。这次调查为党和政府制定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和工作方针，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民主改革和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开创了我国进行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先河，为民族研究搜集与积累了大量弥足珍贵的资料。时至今日，其成果仍然是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依据，是民族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和反复引述的基础材料。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各少数民族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无论是进行决策的党政部门，还是进行理论研究的学术界，要深入进行民族调查的愿望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各级党委、政府迫切需要系统地了解少数民族发展变化的现状，深入探讨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科学地把握少数民族发展的趋势，以制定出适合于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民族政策和发展规划。

如何在新的时期开展民族调查，以获得开拓性的成果，这就不能囿于传统的民族调查方式，而必须有新的观念、新的方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说，分化与整合，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各个学科的发展呈现出日益分化的趋势，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学科之间的整合趋势，各个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其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研究与交叉学科不断增多。

民族学以民族共同体为研究对象。民族共同体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是一个多元化的系统，包含着语言、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科技、卫生等诸多子系统。因而民族学不能仅关注民族的某一局部，必须关注民族的各个方面、整个系统。为此，“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一般都要花费许多时间与人类学以外的专家共同研究。这些时间超过与其他在野外方面的人类学家磋商的时间。”^① 这就是说，如果要对民族的各个方面完整系统地作深入调查研究，仅靠民族学自身特有的理论和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民族和文化的领域十分广阔，单靠民族学的专门化已无法驾驭层出不穷的新的重大课题，这就要借助于其他学科。任何一个民族学工作者都不可能掌握全面的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就要求民族学运用整体论的观点，打破学科封闭，与其他学科交叉协作，进行综合调查研究。”^② 民族调查与研究的实践和历史充分证明，民族学必

① F. 普洛格、D.G. 贝茨著，吴爱明译：《文化演进与人类行为》，第1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须经常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才有可能在许多问题的研究上取得较快的进展与重大的突破，从而不断进步与发展。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继 2000 年组织对云南省人口在 5 000 人以上的 25 个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后^①，2003 年 7 月 ~ 8 月又组织了对全国 32 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与在云南进行的调查一样，全国的民族村寨调查采取了一个“深入”、两个“综合”的方式。一个“深入”，即不对每个民族做广泛的面上的调查，而是每个民族各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村寨，在这一个点上进行深入的投资。两个“综合”，一是调查内容的综合，即对每个民族村寨都进行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风俗习惯、法律、婚姻家庭、宗教、科技、卫生、教育、生态等诸方面的综合调查。二是调查人员的学科综合。在这次调查与研究过程中，除了一部分民族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外，大部分调查人员和研究人员来自云南大学和全国 15 个省区有关大学、科研单位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涵盖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档案学、管理学、人口学、旅游学、语言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还有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如生态学、遗传学、建筑学的人员参与，并专门进行了遗传信息方面的调查。整个调查工作涉及到的总人数为 203 人，其中云南大学的师生 105 人，其他省区 98 人。调查人员中，教师和科研人员 110 人，占 54%（教授 32 人，副教授 40 人，讲师 31 人，高职人员共 72 人，占总人数的 66%）；干部 11 人，占 6%；学生（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82 人，占 40%。调查队伍

① 调查由云南大学的 142 名师生完成，形成了 25 本调查资料、1 本专题研究报告、1 本画册，已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 2001 年出版。此外，还拍摄录制了一批录音带、录像带、照片，采集了云南少数民族 1 300 多人的血样，建立了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

以中青年为主,其中45岁以下170人,占总人数的84%。

经过周密部署和精心组织,此次调查虽然历时不长,但取得的成果是多方面的:

1. 作为云南大学建校80年来第一次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民族调查,接触到了省外各民族的习俗和风情,开阔了视野,为云南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的建设 and 上水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与国内相关省区建立起了密切的学术联系,为以后的民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省外32个调查点可以成为云南大学今后长期合作研究的基地。

2. 积累了跨省区、跨校合作开展田野调查和进行研究的经验。诚如民族学界所指出的:“大规模的综合调查不是少数人所能承担的,组织协调也比较复杂、困难。”^① 这次调查的32个少数民族村寨,分布在全国15个省区,地域非常广阔,仅靠云南大学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因此,这次调查突破了一般传统,与所调查民族地区的有关单位合作,分工完成。15个省区的41所大学、科研单位、政府有关部门积极参与了由云南大学组织的调查和文稿撰写工作。其中,台湾佛光大学承担了台湾高山族(泰雅人)的调查,开了该校与大陆合作进行民族田野调查的先河。

3. 此次调查以多学科的形式合作配合,交叉渗透,对于民族调查工作来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比如在此次调查中,加入了体质健康调查小组,仅用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31个民族(不包括台湾泰雅人)约1500多份血样的采集,也搜集到了部分实物。这样,调查工作就为云南大学少数民族遗传信息资源库建设、博物馆建设等创造了一定条件。

①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修订本,第166页。

4. 此次调查收集了大量的文字、音像资料,大部分为第一手资料,为调查资料的整理、写作以及专题研究提供了条件,也弥补了过去有关民族调查中调查手段或内容单一的不足。共形成了32个少数民族村寨的调查资料32本,文字总量1000余万字;形成了民族生态、人口、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婚姻家庭、文化、风俗习惯、教育、科技、卫生、宗教13个专题研究报告,文字总量约为30万字;1本调查工作实录28万字。此外,32个民族调查组均拍摄了大量照片,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工具、生活场景、文化习俗、宗教活动等各个方面,照片总量达10000余张。许多调查组运用了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拍摄了近百盘录像带。有些调查组对民族语言、民歌、民谣等进行了录音,带回一批录音带。

5. 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作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民族学必然要以田野工作为其研究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法。可以说,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在调查过程中,各调查组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障碍,磨炼了调查人员特别是学生的意志,运用与深化了所学的理论知识,掌握了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在实践中锻炼了思想品德,增长了才干。同时一批新的人才加入到民族研究的队伍中来,增强了民族研究的力量。

当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规模如此浩大的民族调查,问题和不足在所难免。如有的调查人员缺乏调查经验,有的调查还比较粗糙。从总体上看,各本调查资料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高低、深浅之分;从每一本调查资料来看,各部分之间的调查深度和研究水平也不完全一致,也有高低、深浅之别。这大概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众手成书情况下都不可避免的问题。

现在,我们把32个民族村寨的调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专题研究报告整理出来公开出版，是因为这些成果真实地记录了现在时段这些民族村寨的全貌，是第一手的最新资料，相信会有现实的参考价值和历史的保存价值。其中调查工作的实录，比较具体完整地反映了这次工作的整个情况，相信也是有意义的。

民族调查是一项长远的宏伟的工程，这次的成果也仍然只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的工作还会长久地进行下去。诚恳地希望一切关心民族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同仁给我们批评，指正，使这一幼苗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2004 年 5 月

前 言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向 21 世纪的时候，当人类面对着更大的发展进步也承受着更多的挑战和痛苦的时候，传统与现代、发展与变迁的种种命题同样交织并缠绕着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加之 20 世纪末以来席卷世界各个角落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发生了难以置信的改变。所有这些，都使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少数民族的客观、具体的实证调查成为一种必要和必然。云南大学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帷幕的。

一、调查点的概况及选点理由

中国的柯尔克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民族，尽管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却仍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元。此次中国民族村寨调查，柯尔克孜族调查组的调查地点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黑孜苇乡库拉日克村吾依组。

柯尔克孜族主要聚居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全国柯尔克孜族有

160 823 人，其中 77.4% 居住在克州境内。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成立于 1954 年，下辖三县（阿合奇、阿克陶和乌恰）一市（阿图什），其中乌恰县和阿合奇县是我国柯尔克孜族的主要聚居县。乌恰县 2002 年人口数量为 44 603 人，其中柯尔克孜族 32 233 人，占全县人口总数的 72.27%。乌恰县地处克州西部，位于克孜勒苏河的上游，1938 年设县。全县面积约 19 600 平方公里，除了主体民族柯尔克孜族外，还居住着维吾尔族、汉族、乌孜别克等 11 个民族。

黑孜苇，柯语为“克孜勒吾依”，意为红色洼地。黑孜苇盆地处于乌恰县中部，地形四周高、中间低。海拔 2 136.7 米，属中温大陆性荒漠气候，历年 7 月平均温度 19.9℃，1 月平均温度 -8.9℃。全乡有耕地面积 15 895 亩，草场面积 262.96 万亩，是一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地区。乡人民政府驻地即旧县城。

库拉日克行政村地理坐标为北纬 39°41′，东经 75°11′，海拔高度为 2 134.6 米，拥有耕地 2 019 亩。2002 年总户数 201 户，总人口数 843 人。下辖 6 个村民小组：冬、羊叶尔、八村、科可托布、库拉日克和吾依。

“吾依”，柯尔克孜语是“凹地”、“小盆地”的意思。吾依村位于黑孜苇盆地中部，距乌鲁木齐市 1 552 公里，距自治州首府阿图什市 110 公里，离新县城约七公里，离黑孜苇乡政府所在地约一公里。村庄坐落于喀康公路的南侧，离公路仅几步之遥。村西有一条南北向的公路，北接喀康公路，南达乡政府所在地，另有一条横贯整个村子直通冬小队的公路，呈东西向，与喀康公路平行。村子的交通可谓四通八达，不论是到其他村落还是乡政府或是到县城都十分方便。

据 2002 年的统计资料，吾依共有 60 户人家，238 人。其中绝大多数为柯尔克孜族，仅有 3 户维吾尔族。吾依组周围的

村寨也多数是柯尔克孜族聚居村，除了东边的冬小队以维吾尔族居民为主以外，西边的库拉日克小队、羊叶尔小队、科克托布、八村等均以柯尔克孜族为主。位于库拉日克行政村西边的羊叶尔农场和西北的帕米尔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以汉族为主，吾依村民与当地的汉族居民之间在经济、生活上有密切的联系。

之所以在众多的柯尔克孜族村寨中选择吾依组作为调查点，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第一，乌恰县是柯尔克孜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而库拉日克村吾依组是这个地区内典型的柯尔克孜族村寨。第二，吾依组人口规模小，聚居集中，便于调查工作的展开。如果选择整个行政村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则库拉日克村 2002 年总户数达 201 户，由于时间的限制，既不易于把握调查对象也不利于调查工作的纵深开展。如果选择居住分散、户数较少的纯游牧型聚落作为调查对象，则由于户数过少而无法达到以一个村寨来透视整个柯尔克孜族社会变迁、发展轨迹的目的。同时吾依组所在地区交通方便，有利于我们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三，从经济发展和生计方式来看，吾依村经济发展水平居中，村民农牧兼营，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较强的代表性。村中既有相对聚集的定居点，又有牧民在牧场上放牧，我们可以对村民的经济、生计方式作全面地了解，同时也可以对游牧民族从纯游牧到农牧兼营的过程中发生的变迁进行更好地把握；乌恰县的吉根乡及阿合奇县的山区等地虽然也是柯尔克孜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但由于是纯牧区，村民 7~8 月份大多在夏牧场，居住分散，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无法完成调查任务。第四，在 1958 年的柯尔克孜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中，曾经对乌恰县进行过较为全面的调查，形成了《乌恰县柯尔克孜族调查报告》等调研报告，涉及乌恰县柯尔克孜族生存的自然环境、族名、族源、历史、社会政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材料，同时，也为我

们现阶段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背景和参照，可资借鉴、对比，以更好地认识当地柯尔克孜族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变迁和发展。

二、调查组的构成及调查工作的开展

中国民族村寨调查由云南大学发起，柯尔克孜族调查组由云南方和新疆方联合组成。调查组共有6名成员，实行双组长负责制。云南方组长董秀团，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师，民族学在读博士；组员有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民俗学硕士研究生吕雁，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系本科生朱刚。新疆方组长万雪玉，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组员有新疆社科院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艾莱提·托洪巴依和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曹盟。整个调查组成员具有多学科的背景，为调查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必要的学科支撑。全组6名成员中，有汉族3人，白族2人，柯尔克孜族1人。

云南大学的3名组员于2003年7月17日抵达乌鲁木齐，受到了新疆大学文科基地的接待，新疆自治区民委的有关领导向调查组介绍了相关的情况。调查组6人于7月22日从乌鲁木齐出发到达喀什，克州民委的有关领导专程前来迎接。当日中午，到达克州州府阿图什。下午在阿图什拜访了克州宣传部长及州史志办、州统计局等部门，查找了部分资料。当天下午，克州民委的有关同志将我们送到乌恰县城，受到了乌恰县统战部、民宗委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县统战部、民宗委还派专人吕建军同志陪同调查。7月23日上午，在县统战部和民宗委有关同志的陪同下，到达了我们的调查地黑孜苇乡。调查组成员先到乡政府同乡干部及库拉日克村的村干部见了面，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调查目的及调查工作的安排等，乡里的领导也将库拉日克村的大致情况向我们作了介绍。为了更好地开展调

查工作，我们决定住在村公所，为此，村公所将两间办公室让我们住。库拉日克村下辖6个村民小组，我们选择了其中离村公所较近、人口规模适中的吾依组作为主要的调查对象。

从7月23日进驻村中开始工作，到8月23日离开村子，在吾依村的调查刚好是一个月的时间。调查组8月24日从喀什乘火车返乌鲁木齐，8月27日返回昆明，从离昆至返昆，整个调查历时42天。

进村之后，我们立即开始工作。7月24~26日，分别访问了乡里、村里管统计、计生、宗教工作的负责人员，摸清了基本的情况。7月27日~8月4日，是入户调查的阶段，我们对村中的44户人家进行了入户访谈，调查的内容涉及家庭人口、经济收入和支出、婚姻、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在此期间，我们还抽出时间访问了乡里的有关部门，如乡兽医草原站、乡文化站、乡派出所，并访问了乡民政干事、乡计生专干等。8月5~6日，召开专题座谈会，就风俗习惯、婚姻家庭等问题选择了合适的报导人进行座谈。

由于我们调查的吾依村是一个农牧结合的村寨，传统的畜牧业依然在村落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且该村今年仍有14户人家在夏牧场上放牧，因而我们决定上夏牧场对这些人家进行访谈，并对畜牧业进行调查。吾依村的夏牧场过去一直在玉奇塔什草原，但由于过度放牧，今年该牧场休牧，吾依所在的库拉日克村即一大队是借用二大队的草场进行放牧，该牧场离我们所在的村公所约一百五十公里。在县、乡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于8月7日上牧场，到8月11日返回，调查了牧场上牧民的生活情况。

8月13~17日，我们对一些专题进行了深入访谈，访问了玛纳斯奇、即兴诗人、库姆孜琴手、阿訇等人士。同时，在村里进行了资料的查缺补漏工作。8月18~21日，我们访问

了县城有关部门，包括县委组织部、文体局、史志办、民宗委、民政局、计生委、扶贫办、教育局、水利局、武装部等，并用3天的时间，请当地的两位教师帮助进行了语言材料的录音。

8月22日，调查组参观了伊尔克什坦口岸。8月23日离开吾依村踏上返程。经过一个多月的驻村调查，我们对当地柯尔克孜族的生态环境、人口、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情况均有了一定了解，加深了我们的认识，也为后面调查报告的撰写打下了基础。

进驻村中，我们在最初几天熟悉了情况之后，就将组员分成3个小组，加上乡政府派给我们的2名翻译以及我们聘请的翻译——在乌鲁木齐商业学校读书放假回家的学生艾力，保证了每个组均有一名柯尔克孜族工作人员，分头进行调查。从刚入户开始，村民就一直积极地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不管手头有多忙的事，都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和他们在一起，融入了村民的生活，也打开了他们的心扉。调查期间，调查组员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在村民家里进进出出，和村民一起围坐在餐布前吃着各种可口的食物，村民为我们宰羊，为我们做博尔沙克、做纳仁，给我们喝马奶子、吃酸奶；村民为我们弹库姆孜、吹口琴，给我们讲玛纳斯的英雄故事。阿斯卡尔副县长、依明江常委及其他县领导经常来看望调查组的工作人员，库拉日克村的村长木沙不仅很多时候陪同我们调查，还为我们租马、租骆驼，陪着我们跋山涉水去夏牧场访问吾依牧民。我们的翻译扎伊尔、哈里木拉提、艾力、阿迪力、阿克巴尔每天陪同我们走村入户，为我们充当与村民交流的语言使者，虽然劳累却毫无怨言。即兴诗人莱丽罕·奥姆希给我们送洗发水、牙膏、香皂、梳子、镜子

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把心爱的手镯、戒指赠送给调查组员。

我们通常在早上 10 点左右开始拜访各家各户，中午 2 点或 2 点半才吃午餐，之后稍稍休息，有的时候中午也不休息，仍然进行入户拜访。当地的村民十分勤劳，很多人没有午休的习惯，在中午依然忙这忙那。下午 5 点到 9 点又是我们的工作时间，晚上 10 点才吃晚餐。由于乌恰地处祖国西部，当地的日照时间长，每天都是 9 点多 10 点太阳才落山，到 11 点左右天才黑下来，因而我们白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到吃完晚饭，调查组成员或者对当天的调查情况进行讨论，或者对当天的调查资料进行核对和整理，或者对调查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或者对调查的方法、技巧、经验进行相互的交流，或者对第二天的工作进行预先的安排，而当所有这一切都忙完了的时候，往往已经是深夜一两点钟了。我们正是在一种既紧张、辛苦、劳累却又时时感受到充实、处处体会到愉悦的生活中进行着我们的调查工作，也时时刻刻获得一种满足感。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调查组的所有成员齐心协力，团结互助，保证了调查工作的圆满完成。

我们还协助云南大学中国民族村寨调查血样采集组的人员顺利地完成了对村民的血样信息采集工作。在副县长阿斯卡尔和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塔延的带领下，村民们积极踊跃地献上自己珍贵的鲜血血样。除了在吾依村进行广泛的入户调查之外，为了更好地认识某些专题或相关问题，我们也在吾依村周围的几个村寨进行了一些田野工作，如访问了羊叶尔小队的即兴诗人、民间故事讲述家，邻村的毡房制作者，民族乐器库姆孜制作者，玛纳斯奇等，我们还去羊场参加了一次婚礼，去羊叶尔小队的墓地参加了一次宗教仪式，去考察了黑孜苇水泥厂旁的朝拜圣地“库克托别”。

三、调查研究的方法

从调查的方法上来说，我们采用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召开座谈会、问卷统计等都是我们常用的调查方法，其中，又以访谈采用的频率最高。除了入户阶段一般性地访谈外，还有针对性地对一些重点报道人进行重点访谈、深度访谈，对一些报道人反复进行多次地访谈，有的访谈次数达到十多次。为了更有效地进行调查，我们除了紧紧围绕云南大学编制的中国民族村寨调查大纲之外，还针对一些重要专题补充设计了许多开放式的问卷和数百个问题，使得专题调查更加全面、深入。对婚礼、宗教仪式等民俗活动，则采用了参与观察的方法，我们还坐车、骑马、骑骆驼、骑毛驴、步行走路，动用了各种交通工具，到离村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夏牧场上访问在山上放牧的牧民，与他们同吃、同住，共同生活了5天的时间，对牧场上的牧民生产、生活进行了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座谈会也是我们调查中的一种重要调查方式，调查组先后召开了9次座谈会，分别由不同层次、不同专题的报道人参加，参加者有县、乡、村干部，有老人，有年轻人，也有具有某方面专长者。每次座谈会人数不是很多，规模一般在4~6人，超过10人的有三次，一次是县、乡、村三级干部座谈会，人数为11人，一次是对丧葬习俗的调查，人数为14人，再一次是对村中老年人就生态、宗教及其他基本问题进行的座谈，人数是10人。

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尽量运用各种先进的调查设备，采用录音、摄影等方式，利用采访机录下了7盒400多分钟的磁带，拍了40多卷1000余张像片。录音的内容涉及玛纳斯演唱、即兴诗人演唱、库姆孜弹奏、口琴吹奏、民歌演唱、婚礼上的哭嫁歌和劝嫁歌、婚礼上的新郎及同伴的演唱、婚礼上的